

# 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性”的实证研究

崔 岩

**内容提要** 本文重点关注城市经历对于人的现代性的影响,立足于实证研究,以是否具有城市经历为核心,对各类群体的现代性水平进行了分析。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称PSM)来控制样本选择偏误,对是否具有城市经历对农村人口的城市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发现城市经历对农村人口的城市性的确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另外,这一影响也随着区域不同而有所不同。同时,本文对现代城市在培育市民社会,提高公民现代性的功能机制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与分析。

**关键词** 城市经历 现代性水平 倾向值得分匹配(PSM)

崔 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100732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

## 一、问题的提出和现有研究

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迅速推进,城市化已成为我国大力发展工业化之后又一重要发展动力。数据表明,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首次超过50%,达到51.3%,这种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百分比的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及其深刻的变化(李培林,2012)。换言之,城市化进程应当推动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还应当推动人的现代性水平。人的现代性的养成,既城市性的养成,它意味着以城市空间为基础的资源分配方式和生产方式对人的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综合影响,是衡量人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程度。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主要以硬件和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主,而软件建设,即城市居民的现代性建设却没有能跟上。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的标志,既应当有最优配置各类资源的功能,更应当有培育市民社会,提高公民现代性的功能。而对于城市是否有这一功能,在学界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换言之,在城市居住的居民和有城市经历的农村居民,和没有任何城市经历的农村居民,在个体现代性上是否有实质性的差异,而如果有这种差异,其差异产生又是因为何种机制,是我们在城市化研究中应当进行讨论的问题之一。因为,只有对公众的城市性产生机制有充分的讨论,我们对城市化的研究才是完整的。这正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城市经历和城市性之间的关系如何。

对于现代性的定义,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现代化是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变化;而个人现代化则是社会个体在价值观念、工作习惯以及生活习惯方面的变化。”(赵联飞 2012)还有学者提出,所谓个人现代性(简称现代性),是指现代化社会中个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模式(杨国枢等 2004)。因此,人的现代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个人现代性是与传统性相对应的概念,是以基于传统农业社会为参照系的人的意识形态的变化的描述,反映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总体性变化。因此,对于个体现代性的讨论,则一定要结合现代化理论和社会现代性来进行讨论。

在对现代性定义的讨论基础之上,学者们也对人的现代性的产生机制进行的讨论,从现代性的形成机制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对城市化进程和人的现代性水平的提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例如,周晓虹(1998)通过对“浙江村”的考察,提出农民工的流动经历与城市生活体验在提高个人现代性方面的作用是有差异的。简单的城市打工经历尽管能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责任感、自我依赖、灵活性和适应性,但从更为宽泛的角度而言,城市打工经历对于现代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秩序感、计划性等现代性的养成却没有显著的影响。徐艳(2001)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农民工现代性状况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容易获得现代性,职业流动次数越多的农民工越容易获得现代性;人际交往范围越广的农民工越容易获得现代性。郭正林、周大鸣(1998)提出,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基于经济的、社会的等宏观机制的限制,例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其各个方面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制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他们现代性的提升。如果要促进农民工现代性的提升,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获得和提高现代性水平。这就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维护和满足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权利。只有这样,增强个体现代性才能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个体现代性的形成往往要依赖外在社会的结构性影响。换言之,不是每个个体能自发形成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现代性不是内生的个体属性,只有与社会层面的宏观结构产生充分互动,在各种外生因素的作用下,个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经历再社会化过程,才能建立新的个体属性,从而达到个体与社会的一致,因此,现代

性是个体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而经历的再社会化过程,是社会成员互动的结果,是社会结构变迁对生活空间产生的作用,从而在生活空间中个体之间互动而形成的新的社会规范的过程。总之,个人现代性既是内在观念、价值的变化,又是社会现代化在个体层面的具体体现,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在微观层面的影响结果。同时,个人现代性还是社会互动的产物,是对现代社会新的规范的适应过程。

由于,学界在城市化过程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中,大多属于定性研究,对于城市经历和现代性之间是否的确存在因果关系还没有较为严谨的基于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将重点关注城市经历对于人的现代性的影响,以是否具有城市经历为核心变量,对各类社会群体的现代性水平进行测量分析。

## 二、数据、变量和相依回归模型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11 年 7 月至 11 月开展的第三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该调查在全国通过 PPS 抽样,共入户访问了 7036 位年满 18 周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

研究中,是否具有城市经历为本文的核心变量。其中,变量中的“是否有城市经历”中的农民指的是出生在农村,且从未有过任何城市经历的农村群体;本地城镇化居民指的是出生在农村,因为本地“村改居”而成为非农人口的群体;有城镇经历回到农村指的是出生在农村,因就业、教育原因有过在城市的经历,现在又在农村居住的群体;有城镇经历留在城市指的是出生在农村,因就业、教育、婚姻原因有在城市的经历,现在还在城市居住的群体;城镇居民指的是出生在城市,且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城市人口。

对于现代性,我们从一下三个角度进行测量,即“个体效能感”、“城市性指标”和“社会参与”。本文中,我们没有把现代性狭窄的界定在与传统性相对的人对于自身发展、家庭关系、性别平等领域。因为城市化进程对人的影响除了对传统性观念的修正,还涉及到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民主体意识的提升。因此,我们在测量现代性的时候,把“个体效能感”和“社会参与”界定为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个体效能感”指的是受访者对于在公共事务决策和管理中是否具有主体意识,是否有权利主体感的测量(李春玲 2011 范雷 2012)。“城市性指标”主要从受访者对于婚姻家庭的态度、个人价值取向和关系取向等方面测量其现代性水平。“社会参与”则

对受访者的社会组织参与水平进行了测量。另外,我们还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对各类群体的现代性进行讨论,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现代性休闲指标”<sup>[1]</sup>。研究包括的其他具体控制变量的描述见表 1。

表 1 模型变量基本统计量

变量	变量定义	百分比	变量	变量定义	百分比			
被访者性别	1 男性	46.38	社会经济地位	1 上	0.47			
	0 女性	53.62		2 中上	7.58			
教育程度	1 未上学	12.51		3 中	42.32			
	2 小学	24.93		4 中下	29.71			
	3 初中	29.30		5 下	18.44			
	4 高中	11.54		6 不好说	1.48			
	5 中专	5.77	户口性质	农业户口	56.89			
	6 职高技校	0.90		非农户口	42.99			
	7 大学专科	7.86		其他	0.11			
	8 大学本科	6.54						
	9 研究生	0.65	是否曾务农	1 一直务农	27.80			
婚姻状况	1 未婚	9.35		2 一直从事非农工作	37.05			
	2 已婚	80.32		3 有农业和非农经历	31.14			
	3 其他	10.33		4 没有工作(包括务农)	4.01			
有城市经历	1 农民	38.92	年龄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2 当地城镇化居民	5.41		17	101	48.388	16.056	
	3 有城镇经历回村	4.59	个体效能感	-8	8	-1.016	3.748	
	4 有城镇经历留城	22.00	城市性指标	-13	20	6.181	5.339	
	5 城镇居民	29.08	社会参与	0	4	0.496	0.884	
村居类型	1 居委会	61.46	现代性休闲	-0.82367	6.64126	0	1	
	2 村委会	38.55						
出生在直辖市、省会市	0 否	0.821						
	1 是	0.179						

我们所提出的模型的假设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因城市经历不同而有不同的现代性水平,即城市经历越丰富,现代性水平越高,因此,城市居民的现代性水平应当高于农村居民,而有城市经历出生在农村的群体的现代性水平也应当高于没有过城市流动经历的农村群体。

为了讨论城市经历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相依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见表 2)。从模型可见,

对于城市性水平而言,城镇居民较之其他群体有比较高的城市性得分( $\beta=1.055$   $\rho<0.001$ );而相对于农村人口而言,“村改居”形成的城镇居民并没有体现出更高的城市性水平。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于有城市经历的群体,不论其是否留在了城市,其城市性水平都要高于农村人口( $\beta=0.713$   $\rho<0.05$   $\beta=0.515$   $\rho<0.01$ )。同时,我们还看到,有过非农就业与城市性水平也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关系( $\beta=0.648$   $\rho<0.001$ )。

表 2 城市经历与城市性、主体意识、社会参与、娱乐形式的相依回归模型

	城市性模型		主体意识模型		社会参与模型		娱乐形式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常数项	5.844***	(0.463)	-2.145***	(0.312)	0.772***	(0.072)	0.511***	(0.071)
参照组:农村								
哑变量:当地城镇	-0.477	(0.308)	0.557**	(0.207)	0.033	(0.047)	0.004	(0.047)
哑变量:有城镇经历回村	0.713*	(0.335)	0.058	(0.224)	0.13**	(0.053)	-0.065	(0.051)
哑变量:有城镇经历留在城市	0.515**	(0.210)	0.667***	(0.141)	0.049*	(0.033)	0.205***	(0.032)
哑变量:城镇	1.055***	(0.235)	0.629***	(0.158)	0.019	(0.037)	0.379***	(0.036)
非农就业经历	0.648***	(0.193)	0.258*	(0.130)	0.057*	(0.030)	0.075**	(0.030)
非农户籍	0.653***	(0.198)	0.39**	(0.133)	-0.019	(0.031)	0.019	(0.030)
控制变量:								
性别	0.095	(0.132)	0.105	(0.089)	-0.022	(0.021)	0.043*	(0.020)
婚姻	0.106	(0.170)	-0.152	(0.114)	-0.121***	(0.026)	-0.314***	(0.026)
被访者年龄	-0.032***	(0.005)	-0.029***	(0.003)	-0.009***	(0.001)	-0.014***	(0.001)
教育程度	0.263***	(0.043)	0.398***	(0.029)	0.118***	(0.007)	0.149***	(0.007)
社会经济地位	-0.074	(0.073)	0.134**	(0.049)	-0.057***	(0.011)	-0.085***	(0.011)
Adjusted R2	0.077		0.132		0.172		0.323	

p<0.001\*\*\* p<0.01\*\* p<0.05\*

对于主体意识模型而言,城镇居民、“村改居”居民、留在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意识水平都要高于农村人口。同时,有过非农就业与主体意识水平也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关系( $\beta=0.258$   $\rho<0.05$ )。

对于社会参与模型而言,只要有过城市经历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参与水平都高于农村人口 ( $\beta=0.13$ ,  $\rho<0.01$   $\beta=0.049$   $\rho<0.05$ )。可见,有流动经历的群体对于次级社会群体的认同度较高,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也更高。这说明当农村人口在新的城市环境中,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再是以亲缘关系为主,城市生活的流动性使得农村人口对于社会组织的依赖感更强。另外,城市生活的复杂性也使得农村人口对于社会组织的信息提供、资源共享功能有更强的认同感。模型还显示,有过非农就业与社会参与水平也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关系( $\beta=0.057$   $\rho<0.05$ )。

对于娱乐休闲模型而言,有城市经历并且仍然在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口和城镇居民的现代娱乐指标都要高于农村人口 ( $\beta=0.205$   $\rho<0.001$   $\beta=0.379$   $\rho<0.001$ )。同时,有过非农就业经历的群体现代娱乐指标也要高于只有务农经历的群体( $\beta=0.075$   $\rho<0.01$ )。可见,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的条件下,有城市经历并且仍然在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口的娱乐形式已经和农村群体有着较大差异,城市经历的确对其娱乐生活的选择偏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是城市经历对其价值观、生活理念等方面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参与有一定体验性的文化活动,从文化活动的参与中加深对现代生活的认知,而不是简单的打牌之类的放松活动。对于那些曾经有过城市经历,但是又回到农村居住的群体,因为其生活环境有了一定变化,农村的文化生活比起城市来说较为单一,由于条件限制,也就无法参与文艺演出等形式文化活动,其指数与没有城市经历的农村居民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也就不足为奇。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尽管我们还不能确立城市经历和现代性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模型至少说明,具有城市经历的群体与其城市性、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之间的确有一定的统计上的显著正向关系。而对于“村改居”式的城镇化,这一群体在城市性和社会参与上与农村居民没有显著的差异,换言之,硬件建设的城市化,也就是高楼大厦的建设,不能等同公民在观念态度、价值理念上的城市化,只有提高意识形态方面的城市化软件的建设,提高公民的现代性意识,在观念上称为“城市人”,才是城市化建设下一步

推进的重点所在。

### 三、假设和研究方法

对于城市经历和现代性之间的研究,我们如果通过建立普通的回归模型,尚不足以确立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因为一般回归模型通常只能回答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因为,为了确切的回答城市经历是否能有效的提高公民现代性这一基于因果关系的问题,我们只有通过建立倾向值得分匹配模型,才能更好的说明城市经历和现代性之间的因果联系。换言之,普通的回归模型并不能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逻辑联系,只有通过样本的选择性进行控制,然后对相关指标进行考量才能够比较有效的建立逻辑上的因果联系。在这里,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我们只对个体的城市性水平建立匹配模型进行分析。

基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假设拥有城市经历对于个体的城市性有显著的影响,即有城市生活体验会有效的提高人的价值观和态度行为的现代性。为了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本文首先考虑影响能否取得城市经历的因素,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受访者取得城市经历的概率值,即倾向值得分(propensity scores)。倾向值得分匹配旨在估计影响效果之前,找到与处理组尽可能相似的控制组,通过控制多个影响变量得到倾向得分,从而使多元匹配成为可能,降低样本选择偏误。因此,在得到倾向值得分之后,我们则可以在控制取得城市经历的概率值条件下,计算平均处理效果(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简称 ATT)。也就是说,我们采取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对未取得城市经历的群体(控制组)和取得城市经历的群体(处理组)相匹配,估计平均处理效果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常用的匹配方法包括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分层匹配法,以及核匹配法(Becker & Ichino, 2002)。同时,为了对不同倾向值得分的影响效应的差异进行分析,本文将采用异质影响模型(Analysis of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Wu & Xie, 2003),该模型假定每一个倾向值得分的小组有不同的影响效果,来讨论不同倾向值得分之间影响效应的差异。

### 四、对模型的分析

1. 样本匹配过程及效果 首先,我们采用 Logistic 模型估计受访者取得城市经历的概率值(见表

3) 计算倾向值得分。从 logistic 选择模型可以看出, 核心自变量为性别、教育程度、是否在城市(直辖市、省会市)附近出生,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

龄平方项、社会地位、是否有非农经历、非农户籍。从模型可见, 教育程度越高, 越有可能有城市经历, 女性更有可能有城市经历。

表 3 基于 logistic 的样本选择模型(自变量:是否具有城市经历)

	系数	标准误	z 值	P 值	置信区间下限	置信区间上限
教育程度	0.314	0.030	10.510	0.000	0.256	0.373
性别(男性=1)	-0.660	0.082	-8.020	0.000	-0.822	-0.499
年龄	-0.136	0.014	-9.440	0.000	-0.165	-0.108
年龄平方项	0.001	0.000	9.230	0.000	0.001	0.002
城市附近出生	0.207	0.222	0.930	0.352	-0.229	0.643
社会地位	0.161	0.038	4.190	0.000	0.086	0.237
有非农经历	2.388	0.115	20.690	0.000	2.162	2.614
户籍(非农户籍=1)	1.266	0.098	12.900	0.000	1.073	1.458
常数项	-0.545	0.410	-1.330	0.184	-1.348	0.259
模型样本量	4722					
伪 R 平方值	0.343					

2. 各种处理效应方法估计结果 在 logistic 选择模型的基础上, 我们得到了倾向值, 然后则要对倾向值得分进行匹配, 分别采用了上文提到的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分层匹配法, 以及核匹配法对平均处理效应进行估计影响效果(见表 4)。分析可见, 在控制了样本的选择性之后, 城市经历对城市性水平的影响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 例如, 以最近邻匹配法得到的 ATT 值为 0.715, 在 0.01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可见, 在对城市经历倾向值得分进行匹配之后, 拥有城市经历可以提高城市性水平 0.715。

表 4 基于控制样本选择性的城市经历对城市性水平的影响

	处理组	控制组	平均处理效应(ATT)	标准误	t 值
最近邻匹配法	1829	1058	0.715**	0.296	2.416
核匹配法	1756	2928	0.900***	0.235	3.837
分层匹配法	1714	2841	0.843***	0.253	3.339
半径匹配法	1714	2880	1.419***	0.174	8.143

p<0.001\*\*\*p<0.01\*\* p<0.05\*

3. 城市经历对不同倾向值得分群体的影响 因为每个个体的“禀赋”有所不同, 因此取得城市经历的模式也有所不同, 比如上学、就业、结婚等。如上所述, 城市经历对个体的城市性的确有显著的影响。那么, 对于“禀赋”不同的群体, 也就是说有不同倾向值得分群体, 城市经历对城市性的影响是否也是不同的。这里我们使用异质影响效应模型(吴晓刚, 2008, Wu & Xie, 2003), 对影响效应在不同倾向值得分层次的效果在统计上进行分析。用异质影响效应模型估计每个倾向值得分层次上受到影响效应对个人城市性的效果, 然后对各个倾向值得分层次的影响效应汇总建立线性模型进行估计(见表 5)。

表 5 城市经历对城市性水平的异质影响效应模型

倾向值分组	系数	标准误	z 值	P 值	置信区间下限	置信区间上限
1	-1.189	0.948	-1.250	0.210	-3.048	0.669
2	-1.782	0.829	-2.150	0.031	-3.407	-0.158
3	0.842	1.200	0.700	0.483	-1.511	3.194
4	2.411	0.767	3.140	0.002	0.908	3.913
5	1.263	0.476	2.650	0.008	0.329	2.196
6	0.569	0.390	1.460	0.145	-0.196	1.333
7	1.691	0.413	4.090	0.000	0.881	2.502
8	0.062	0.746	0.080	0.934	-1.401	1.524
9	0.346	1.169	0.300	0.768	-1.946	2.638
斜率	0.242	0.109	2.220	0.026	0.029	0.455
常数项	-0.520	0.643	-0.810	0.418	-1.780	0.740

当我们不对样本进行任何区分时, 异质影响效应模型反映了倾向值得分与观念现代性得分之间的关系。首先, 整体而言, 异质影响效应模型将样本分为 9 组, 且随着倾向值得分的增加, 观念现代性得分也随之增加(模型的斜率为 0.242,  $p<0.05$ )。由此可见, 当受访者越有可能有较高倾向值得分时, 是否受到影响效应的作用对其现代性得分的作用越为显著, 其影响方向为正向作用。再从系数的数值和显著性看, 影响效应对于较低倾向值得分组和较高倾向值得分组的影响较小; 也就是说, 影响效应的作用和倾向值得分之间是呈现非线性关系的。具体而言, 例如对于第一组和第三组, 是否受到影响效应的作用对其现代性得分在统计上没有显著的影响; 同样, 对于第八组和第九组, 影响效应的作用对现代性得分也没有显著的影响。然而, 对于第四组、第五组和第七组, 是否受到影响效应的作用则对其现代性得分在统计上有显著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2.411,  $p<0.01$ ; 1.263,  $p<0.01$ ; 1.691,  $p<0.001$ )。这说明, 当受访者有较低倾向值得分组时, 尤其是其受教育程度和其他“禀

赋”较低时,城市经历本身也不会对其现代性观念产生影响。这部分群体主要是我们所谈到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城市经历更多的是保有工具性的心态,以提高自身经济生活为主要驱动。同样,对于倾向值得分较高的受访者,其已经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和个人禀赋,从而已经有较高的现代性得分,因此城市经历本身这一影响效应也不会对其主观观念和态度产生显著的影响。只有对于教育程度处于中等的群体,城市经历对主观观念和态度的有着显著影响。因此可见,除了受教育程度,城市经历可以对该群体的观念态度有显著的作用,从而说明在个体层面,城市经历与现代性之间有显著非线性关系(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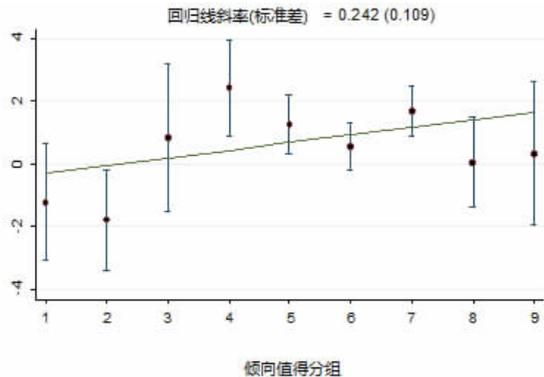


图 1 城市经历对城市性水平的异质影响效应模型

### 五、对城市化问题的分析和进一步讨论

1. 公民城市性的提升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推进,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所打破,城市和农村人口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城市化进程不仅仅是高楼大厦和各种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更应当伴随着公民城市性的提升。城市经历不仅仅是在城市里以寻求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工具性动机,更是通过与城市群体互动,体会城市文化和生活,对于城市群体的观念和态度的认知,进行再次社会化的过程。L. Wirth 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一文中提出了“城市性”(Urbanism)的概念,他认为,现代城市不同于乡村社会,有着自己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Wirth, 1938)。而城市性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所体现的是“自身特有的城市心理,与乡村心理迥然不同”(帕克、伯吉斯、麦肯齐,1987)。而只有在公民城市性得以形成和提升的前提下,城市化的发展才有实质的意义。换言之,城市化不仅仅是居住空间和居

住模式的变化,更是在公民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的基础上,内在素质、观念和人格的整体提高,从而在外在行为上形成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的现代社会行动模式。因此,城市化的硬件建设并不一定意味着“现代社会”的形成,而只有注重城市化过程中的软件建设,加强公民对现代文明、现代理念的认同和接受,才能逐步形成新型城市社会的价值观和现代生活方式。对于刚刚接触城市社会的广大农村人口,拥有一定的城市经历,对其建立独立自主、民主平等价值观念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上文分析可见,就特定群体而言,城市经历对现代性提升是有显著的影响的。来自农村的人口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既有其经济利益和其他功利性诉求的一面,例如谋生和提高生活质量等动机,也有寻求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享受城市精神生活和感受城市文明等非功利性的诉求。通过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农村人口在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更加贴近城市社会,与城市人口有更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交集。城市的生活经历不仅仅是来自农村群体对城市现代生活的体验,更是一种人的再社会化过程。城市经历提升了农村人口的意识形态现代化和个体的效能感,增强了对社会参与的内在动机和主体意识,降低了旧有的保守观念和以初级社会群体为主的社会交往的封闭性,促进了观念现代性的形成。

分析还显示,现有的“村改居”这种居住模式的城市化则并不能带来价值观念的提升,也自然不能形成城市性的现代理念。旧有的乡村社会并不能因为行政属性的变更和居住空间的改变而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这一过程。因为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较之城市严重滞后,农村的现代化水平较低,农民群体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上,还较落后和保守。因此,农村人口的现代性的获得和提高是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居住模式和行政管理属性的变化而得以实现,城镇化建设也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硬件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而促进农村群体的现代化,则必须要实现农村人口生活习惯和行为模式的现代化。这就需要促进城市和农村的交流,通过媒体等多种形式的引导,逐步培养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理念,提升精神领域的现代化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民从传统性人格过渡到现代性人格,才能促使农民向公民的转变。

2. 城市经历对于提升现代性的作用机制 结合以往的研究,公民现代性是指人的观点、态度和行为

方式的现代化。而城市性又是现代性中基于城市空间的特质而形成的一个维度。城市生活不仅仅是现代社会基于资源最优而形成的居住模式,更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的生产、生活的社会宏观建构模式和微观互动模式。城市生活为人们提供了特殊的生活世界和社会网络,因此城市经验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人格现代性和城市性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城市互动中,随着人们参与到各类城市组织和机构,与多元化理念和多维度信息有着频繁的接触,面对更多的文化体验的机会,旧有的以亲缘关系和遵从权威为基础的乡村集体主义必然逐渐向基于平等自由和理性认知为核心的城市个人主义过渡,从而改变传统的人格特质,形成新的现代社会取向,在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等维度(杨国枢,2004)有着显著的转变。

因此,农村人口的城市经历不能简单的等同于进城务工、进城居住(王兴周、张文宏,2008);农村人口的城市经验代表了形成城市性市民化的转型。对于农村人口而言,城市性的形成是一个居住、就职、身份、观念、交往和生活方式多层次发展的过程。居住城市化、就业城市化不是完全的城市化,身份、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城市化和城市文化养成才意味着城市化的完成。而城市经历对农村人口的人格理性化、交往社会化、文化包容化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城市的经济生产组织模式和社会交换模式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的关系取向和权威取向。在取得城市经验之前,农村人口所处的社会经济组成基本上还处于封闭型的非市城交换的自给自足经济状态。生产方式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分工合作,经济组织往往以家族为单位,物质交换主要存在于初级社会关系之间,资源分配主要依赖于传统权威。不同于现代市场经济,在亲缘关系中的身份的特定性主导着大部分经济活动,缺乏对次级社会关系的依赖和平等交换的体验,使得农村人口不熟悉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社会交往和自我认知理念。在积累了一定的城市经历之后,次级社会关系成为了其生活的主要基础,平等参与、自由交换成为了资源的主要配置模式,传统的权威观念逐渐被抛弃,基于特定亲缘身份而形成自我认知逐渐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独立自主的人格意识和平等自由的理念。在生产组织中,分工和合作成为必然,因此个体的价值逐渐被重视,现代意义的人格逐步健全,自封保守的心态逐步转变为开放平等的社会态度,因而现代性,尤其是城市

性,有可能从经济生产活动中得以养成和提升。与此同时,现代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重视科学组织和理性计划,因此,遵从科学观念、计划观念、信息观念等方面都会有所增强。所以说,城市的经济生产组织模式和社会交换模式中所需要的现代性的特征,比如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等一系列现代价值体系,都将成为提高城市性的重要机制。

其次,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也是有效增进城市性的重要机制。如城市的各种文化活动极大的拓宽了人们的生活世界,提升了人们的品味和素质。不同于农村单一的生活娱乐方式,城市中的文化经历更注重大多元的和内在的体验。文化生活不仅仅是休闲属性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反思性的。因此,文化活动有助于提升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与多元文化的接触更能养成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在城市文化的熏陶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并对人们的城市性养成有重要影响。同时,城市生活世界的交往通常是基于共同爱好,而非亲缘关系的。这种互动的前提是人格的非依附性和独立性,因此,能有效的提升人们对于关系取向、尊重两性平等、性别婚姻态度等方面现代性水平。另外,城市人口的异质性和大量的流动人口为人们提供了与不同群体接触的社会交往机会。不同于传统农村社会的封闭、静态、保守的社会形态,城市社会呈现出更多的动态活力,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群体在城市这个空间中得以充分互动,丰富了人们的社会阅历,增加了对不同观念、不同意识形态的认知和理解,促进了平等、宽容的城市心态的培养,提高了人格现代性的层次,感性优先和墨守成规的心理逐渐为科学理性和开发包容的心态所取代。

再次,对城市公共生活的参与也能增强主体性和个体效能感。农村人口城市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城市公共空间活动的参与。在城市,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群体,通常要考虑更多的与公共政策有关的问题,例如自身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问题。这些方面既是属于宏观政策层面的问题,又与每个在城市的农村人有着紧密的利益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农村人口对公众政策的关心,促进其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参与。其次,不同于乡村社会,城市居民通常体现出更多的对公共领域问题的关注。与城市居民的互动能更有效的提高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能更好的引导其积极地参与公共领域的生活与交流,养成个体效能感和主体意识,主

动为争取自身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来展示和发挥才能,从而真正向具有现代性的市民转变。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从现代性视角来审视城市化进程(胡杰成,2008),可以看出,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来自农村的群体往往以“城里人”为参照群体,进而逐渐进行自我的调整 and 改变,从而逐步习得不同于已有的传统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因此,现代城市的功能不仅仅是对各种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整合,更是具有通过社会互动对公民的现代性进行培育和重塑的功能:城市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模式促使公民形成了基于交换而产生的工具理性,城市中在以业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构了公民关系取向和社会信任的基础,城市中的核心家庭的关系转变了公民对婚姻和性别的态度,城市中的政治、社会生活重释了自我权利的含义和权威的意义,培养了更为独立的个体人格。概言之,城市经历之所以能够促进农村群体在观念上向现代社会转变,主要是通过宏观结构的转换和微观互动的影响,对个体在意识形态、制度、规范的等方面的旧有的认知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正如有学者指出(蔡志海,2004),农村群体现代性产生从浅层次讲是受到城市生活体验的影响,但深层次的机制则体现为农村群体对旧有的农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一种解构,并且以再社会化的形式重构从城市体验中所获得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是一个解构与重构同一的过程。

3. 加强城市软件建设,增强城市培育公民城市性和现代性的功能。城市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其功能除了有效组织社会资源,还有着培育公民城市性和现代性的功能。现代性是社会个体所具有的与传统性相对应的人格禀赋,尽管现代性的概念在学界众说不一,然而,现代性禀赋的特征基本包括个人效能感、独立自主的人格、平等开放的社会态度、尊重两性平等的意识、科学理性的素养和积极社会参与的社会行动。城市,作为现代性的空间载体,其自身应当具备能培养公民现代性的功能。这就要求城市自身具有以上述特征为核心价值观的城市精神。这就需要城市从制度层面消除歧视的待遇,在城市资源配置过程中,以开放性的制度设计,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给予在城市居住的公民平等的待遇,减少排斥性的制度设计,建立健全城市的社会融合机制,只有这样,城市才能为其居民所认同,才能具有培养现代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的功能,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

## 注释

[1] 其中,进入因子分析的生活方式包括看电影、戏剧、表演、听音乐会、打麻将、打牌、阅读、看报纸、外出旅行、电脑游戏、浏览互联网页、酒吧、唱歌、跳舞、串门聊天等。通过因子分析,共取得两个因子,其中一个因子在串门聊天、打麻将/打牌上得分较高,另一个因子在其余选项上得分较高,这样,我们把后一个因子定义为“现代性休闲指标”。

## 参考文献

- [1] 李培林:《城市化与我国新成长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 [2] 赵联飞:《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现代性与虚拟社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 [3] 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4] 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 [5] 徐艳:《关于城市边缘人现代性的探讨——对武汉市260名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北京〕《青年研究》2001年第11期。
- [6] 郭正林、周大鸣:《外出务工与农民现代性的获得》〔广州〕《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 [7] 李春玲:《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上海〕《社会》2011年第2期。
- [8] 范雷:《“80后”青年的政治态度——目前中国大陆政治态度的代际比较》〔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 [9] Becker S. & A. Ichino:《Estimation of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Based on Propensity Scores》,《The Stata Journal》2002年第2(4)期。
- [10] Wu, Xiaogang & Yu Xie:《Does the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3年第68期。
- [11] 吴晓刚:《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北京〕《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 [12] Wirth L:《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年第44(1)期。
- [13] 帕克、伯吉斯、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页。
- [14] 王兴周、张文宏:《城市性: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方向》,〔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
- [15] 胡杰成:《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综述》,《兰州学刊》2008年第12期(总第183期)。
- [16] 蔡志海:《流动民工现代性的探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责任编辑:方心清〕